

# 人的無知與智慧

## ——評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 潘學方



科斯 (Ronald H. Coase)、王寧著，徐堯、李哲民譯：《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我知道自己無知」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名言。蘇格拉底說，正因為自知無知，所以他也就成了當時希臘最有智慧的人。

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 (Ronald H. Coase)

和他的助手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以下簡稱《變革中國》，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進行了解讀，指出中國的轉型在「沒有任何藍圖在手，也不知何處是目的」的情況下，「不經意間」走上了市場經濟之路(頁209)。《變革中國》告訴我們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憑計劃經濟的手段走上市場經濟之路，而是自發產生的市場經濟因素把中國帶出計劃經濟的牢籠。作者認為，「中國的這一經濟轉型是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序〉，頁V)中國的故事也對古希臘先哲的「我知道自己無知」作了很好的闡釋。

### 一 二元改革：有心栽花和無心插柳

「改革開放是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這句話耳熟能

科斯和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憑計劃經濟的手段走上市場經濟之路，而是自發產生的市場經濟因素把中國帶出計劃經濟的牢籠。

「二元改革」是《變革中國》的一個核心關鍵詞。二元改革中的其中一元是指國家主導的、以國營企業為重心的改革；另一元則是所謂的「邊緣革命」，在政府所掌控的範圍之外爆發。

詳。如果說這只是官方敘事而非嚴謹的學術觀點，那麼，改革由政府設計和主導且自上而下進行的觀點，在中國鮮有遭到質疑，甚至可以說，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體記憶。然而，科斯和王寧在《變革中國》中通過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來龍去脈的梳理，令人信服地顛覆了這個記憶。

關於改革開放的啟動，鄧小平於1984年10月10日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的會面中講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點是農業改革，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sup>①</sup>。鄧小平這個講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過程定下了調子：中國的改革，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成功後，在1984年轉為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的城市改革。照此說法，中國改革開放與計劃經濟一樣，也是根據「整體社會工程」<sup>②</sup>（或者說「建構論理性主義」<sup>③</sup>）建構出來的。

《變革中國》卻指出，「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屆政府啟動的經濟改革是從國營企業開始的。『洋躍進』運動着眼於重工業，隨着『洋躍進』運動被終止，政府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搞活國營企業』這項計劃中，到1984年時，工業改革早已在進行之中」；而農業改革，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沒有一句話和『搞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民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相關，相反，〈公報〉強調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

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以及『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這些聲明實際上完全拒絕了家庭聯產承包。把飢餓的農民掀起的農業改革和政府主導的改革混為一談，會使人錯誤地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中國農村接下來發生的變化都是中國政府精心計劃的結果」（頁216）。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農業改革——農業去集體化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自下而上展開的。由於包產到戶被認為會危及集體經濟，直到1981年底，北京一直反對和抵制。

「二元改革」是《變革中國》的一個核心關鍵詞，是理解這本書主要思想的一把鑰匙。「中國經濟轉型中，國家引導的改革與草根改革的雙重存在是毫無疑問的。如果無法正確認識中國改革中的二元結構，我們就很難理解『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故事』。」（頁214）所謂「二元改革」，或者說改革的二元結構，指的是以國家或中央政府為主導的改革與邊緣改革共存。具體地說，在1970年代末到整個1980年代，二元改革中的其中一元是指國家主導的、以國營企業為重心的改革；另一元則是所謂的「邊緣革命」：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崛起、個體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特區的設立；四種邊緣革命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在政府所掌控的範圍之外爆發。市場化轉型中的二元改革體制在1990年代以及之後也一直存在，其中一條道路由中央政府指引；另一條道路則由民間和地方力量驅動，即上海與深圳股票市場的發

展、國企股份制改造和工業園區的進一步發展。

把改革分為「二元」似乎不是新觀點。體制內改革和體制外改革並存，在中國是一個極為流行的說法。「家庭聯產承包和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兩個偉大創造」這句話就寫進了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意思就是除了國家主導的改革，還存在着民間改革。吳敬璉就提出過國有經濟或「體制內的存量」與非國有經濟或「體制外的增量」兩種改革同時存在的觀點（頁214）。但是，體制內外兩種改革並存的說法與科斯、王寧所說的「二元改革」不是一回事。

兩種改革並存的說法「並沒有指明中國經濟改革中兩類不同根源的改革模式」（頁215）：首先，這種觀點沒有跳出整體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戰略說；其次，在這兩種改革說中，強調的是以政府改革為主導，而體制外的改革，如「人民群众的偉大創舉」（頁215）等，只是被吸納到國家整體戰略中，作為政府主導改革的一個構成部分。

二元改革強調的是：真正讓中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並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不是國家主導的改革，而是民間的邊緣革命（頁95）。具體說：

中國領導人絕非有甚麼先見之明或對市場抱有強大的信念，相信市場能夠帶領他們走出低潮並最終實現市場經濟。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改革伊始，一連串的邊緣革命將私營部門及市場力量引入經濟中，這兩者的引入，不僅使由國家主導的改革舉措黯然失

色，同時還為改革指明了市場方向。9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也以類似的、出乎中國政府意料的方式存活了下來。（頁149）

與邊緣革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營企業改革，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低效的。任何針對社會主義經濟核心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由政府主導並被嚴密監管。政府積極參與意味着這些由政府引導的改革努力嚴重受制於僵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繁複的行政控制，從而往往導致令人失望的結果。國營企業改革的失敗，是中國堅持僵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付出的代價（頁219），「中國領導人也一次次因國企改革的失敗而感到失望與無奈時，最終不得不迫使上百萬國企員工下崗。」（頁231）

與此同時，處於政府掌控範圍之外的邊緣革命爆發了：

當飢餓的農民背着政府悄悄地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時，當農民為了更高的收入轉向非農業生產時，當城市中的無業居民不得不自謀職業來維持生計時，當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為了改善生活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偷渡到香港時，這場改革已經悄無聲息地席捲全國。（頁213）

邊緣革命除了引進市場經濟之外，也成了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轉向的催化劑，逐漸改變了社會主義曾經對市場經濟的抵制；為中央政府提供了政治上的緩衝，減少了改革的政治風險；緩解了政治壓力，降低了實施變革的成本（頁220-22）。

體制內外兩種改革並存的說法與科斯、王寧所說的「二元改革」不是一回事。二元改革強調的是：真正讓中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並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不是國家主導的改革，而是民間的邊緣革命。

因此，科斯和王寧斷言：「把中國經濟改革歸功於中國共產黨並非嚴謹的學術。……中國經濟大轉型絕不是靠一個全知全能的政府，處心積慮、耐心設計的結果。」(頁231)「中國的故事恰恰體現了亞當·弗格森指出的『人類行動的後果而非人類精心計劃的結晶』的精髓。一個中國諺語將這個故事描述得更加詩意：『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頁206)

## 二 實事求是與承認無知

作者論證了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是一個「自發」和「意外」的過程。這過程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問題上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作者把他們「摸着石頭過河」或「試錯」的行為解讀為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變革中國》強調改革不是由黨和國家主導，並不意味着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中無所作為。相反，作者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推動者卻稱讚有加：「幾乎沒有人懷疑，如果沒有鄧小平堅持不懈的務實精神和老練的政治方法，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和結果將會完全不同。」(頁238)

由此，該書還有一個關鍵詞叫「實事求是」：「在這個中國故事裏，特洛伊木馬實際上是『實事求是』的微言大義。」(頁209)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根本沒有想到過市場經濟。但他們思想開放，願意接受任何能帶來生產力發展的力量，以及將實踐作為一切的判斷標準(頁57)。他們沒有因為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和信仰而蒙蔽雙眼，對現實視之不見。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的不足，敢於向資本主義學習。這是中國能夠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一個關鍵所在。

在蘇格拉底那裏，「我知道自己無知」這一命題的立論基礎是：只有神有智慧，而人的智慧微不足道。之所以認定神有智慧就是希望有智慧的神能引導無知的人。但正由於人的無知，所以對神是否存在、神是否有智慧，人也無從知曉，至於神的引導更無從談起了。但可以確定的是，人不是神，無知的人不可能洞悉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機構或頭腦能夠憑理性去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認為：「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還是它的維持，都取決於……在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這種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又說：「擴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產物：就像類似的生物現象一樣，它是在自然選擇過程中，通過自然進化而形成自身的。」<sup>④</sup>市場經濟就是通過進化和秩序的自我生存形成的自組織系統。它彌補了個人的無知，使得普遍的、無目標的抽象行為規則取代了共同的具體目標。

可以說，哈耶克的「擴展秩序」集中體現了自斯密(Adam Smith)以來自由主義關於市場經濟的認知基礎。這一認知基礎也成了《變革中國》一書的主要分析工具。科斯、王寧明確提出：「市場經濟建立在兩個深厚的認知基礎假設之上：承認無知和包容不確定性」(頁28)；「只有在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全知全能、通曉一切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才有可能存在」(頁27)。就是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作者論證了中國

走上市場經濟之路是一個「自發」和「意外」的過程。這過程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問題上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我們這一代人，對「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應該最熟悉不過，但它的準確含義卻很難解讀，甚或其本身就沒有準確的含義。有意思的是，《變革中國》卻賦予「實事求是」以「承認無知」的含義，使得這句中國古老格言簡直成了「我知道自己無知」的同義詞，因為作者把中國領導人的「摸着石頭過河」或「試錯」的行為解讀為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正如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們所說的，『要堅持改革，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鄧小平本人可能比其他人更了解在改革的錯誤中學習的重要性」（頁117）。他將「中國經濟改革視為一場冒險與試驗」（頁132）。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兩代領導人的認知態度上。作者指出，「……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從來就不是斯密所描述的醉心於體系的人。毛澤東建構宏圖大略，然後高屋建瓴，將自己的宏偉藍圖展現在中國人民面前。但鄧小平的腳踏實地使他無法接受任何與事實不符的理論。」（頁237-38）

不承認自己無知就會導致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負」：相信人類具有高度發達的理性思維能力，能洞察社會的結構和預見社會發展的規律，故能夠設計人類的未來，建構人間天堂般的理想社會，其結果則是用通往天堂的願望鋪設了一條通往地獄之路<sup>⑤</sup>。波普爾（Karl

R. Popper）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即使懷抱着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sup>⑥</sup>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充分說明了這個道理。

這裏有個問題：走市場經濟之路，中國屬於後發國家，已經有了較完整的理論和成熟的經驗可資利用和借鑒，這與設計一套完整的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方案，然後加以落實與建構一個現實世界上並不存在的理想社會應該不一樣吧？通俗一點講，已有了現成的橋，過河又何必還要「摸着石頭」呢？對這個問題，科斯、王寧認為「中國能有幸逃脫致命的自負僅僅是一個偶然。……中國的改革並沒有以一個全新的藍圖開始，而是延續着對舊體制的修補」（頁208），從而避免了前蘇聯國家「大爆炸」的改革策略帶來的負面後果（頁207）。可見，根據科斯、王寧的觀點，類似東歐「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轉型也屬於「致命的自負」。「漸進性改革」與「休克療法」相比孰優孰劣不好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當時中國，按照東歐國家那樣推行完全拋棄舊體制重起爐灶的改革絕無可能。這正如作者所敘述的，「由於長期與外界隔絕，除社會主義之外，中國領導人對任何別的發展方式幾乎一無所知。這讓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從實際出發，或是改進，或是修補現行的經濟體制。」（頁206）

信奉市場經濟與承認無知之所以在認知基礎上是一致的，是由於

在當時中國，按照東歐國家那樣推行完全拋棄舊體制重起爐灶的改革絕無可能。這正如作者所敘述的，由於長期與外界隔絕，除社會主義之外，中國領導人對任何別的發展方式幾乎一無所知。

雖然《變革中國》高度肯定了中國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以及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這並沒有妨礙作者對「中國奇跡」所存在的問題的洞察。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生產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從本質上來說，市場也是一個集體學習的機制。市場為參與經濟的所有角色提供了一個通過試錯方式不斷學習、不斷挖掘現有機會並開創新機會的平台」（頁223）。這正應了波普爾的一句名言：「從阿米巴到愛因斯坦只有一步。」<sup>⑦</sup> 阿米巴是一種單細胞原生動物。阿米巴與愛因斯坦都用試錯法，他們幾乎是任意的或似雲的試錯運動的方法基本上沒有多大區別。阿米巴和愛因斯坦的一步之差在於對待謬誤的態度：「儘管他（它）們都在使用嘗試和排除錯誤的方法，但阿米巴不喜歡出錯，而愛因斯坦卻對錯誤很感興趣：他懷着在發現錯誤和排除錯誤的過程中學習、提高的願望，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錯誤。」<sup>⑧</sup>

雖然《變革中國》高度肯定了中國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以及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這並沒有妨礙作者對「中國奇跡」所存在的問題的洞察。針對大部分評論家把

「中式市場經濟」的特徵歸結為「中國政府的有形之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強大實力」，科斯和王寧認為「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生產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作者認為，「即使中國在21世紀中葉像眾人所預測的一樣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生產力依舊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她無法顯著提高其創新能力的話。這將成為現代人類史上一個前無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非生產力最高的。」（頁248）同時，中國經濟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相同的結構性缺陷，那就是中國製造的產品雖然琳琅滿目，但卻缺乏家喻戶曉的品牌。中國在《財富》五百強中排名靠前的企業，都集中在能源與服務行業的國有企業；「這些行業受政策保護，沒有開放全球競爭。中國的生產型企業在全球具備競爭力，但大部分企業僅僅在依靠低廉的生產



中國製造的產品雖然琳琅滿目，但卻缺乏家喻戶曉的品牌。

成本打價格戰，在創新與提高質量方面，這些企業依然在苦苦掙扎」（頁248-49）。除此以外，還存在「社會貧富不均日益分化」、經濟自由和私營企業「被殘留的政府所壟斷限制」等現象（頁247）。

中國經濟缺乏創新能力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大學更像一個意識形態無孔不入的行政官僚機構，而不是一個學府」。「中國的大學與自由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整個教育體系依舊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在這裏，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頁250）中國大學缺乏自主性的結果導致了「從經濟到教育，從法律到政治，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都缺乏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頁253）。

確實，以上論述準確抓住了中國問題的關鍵。但作者所指的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筆者認為不無商榷之處。

### 三 思想市場與民主政治

「思想市場」是《變革中國》的又一個關鍵詞。作者指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製造行業致命的軟肋；自由的思想市場的缺失也損害着中國建立和諧社會與重建文化傳統的努力，並導致人才流向海外（頁253-55）。自由思想市場的提出同樣基於對人無知的認知。正因為人的無知，所以任何理論都

無法達到終極真理，也不可能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思想。任何具體的知識都是不完整的、臨時的、推測性的、時時可以修正補充的。思想市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與無知和偏執的無盡無限的鬥爭中，真理才會展現其面目；並且，沒有真理可以一勞永逸地贏得勝利，也沒有權威能夠作為真理的決斷者。由於人類自身易犯錯誤，而且求知過程中人類的無知不可避免，開放思想市場成為最能幫助人類接近真理的工具（頁257）。

應該說，科斯和王寧對中式市場經濟問題的揭示是一針見血的，而對思想市場的洞見也是敏銳而深刻的。但是，這裏把思想市場的缺失作為所有問題產生的原因而不是其中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其中關於思想市場與民主政治關係的論述卻令人費解：「思想市場指向了一條平緩、可行而又直接的政治改革之路。中國同時缺乏民主政治和思想市場，但二者不是一回事。」（頁259）

用思想市場指向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是思想市場的存在，可是該書又明確指出中國缺乏思想市場。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的話，這話的含義是先建立思想市場，然後用思想市場「指向」政治改革之路。問題是，在缺乏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思想市場的建立又如何可能？對此，作者認為：

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當今政治辯論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開放的思想市場才是政治體制運行的

「思想市場」是《變革中國》的又一個關鍵詞。作者指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製造行業致命的軟肋；自由的思想市場的缺失也損害着中國建立和諧社會與重建文化傳統的努力。

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市場在當今只出現在民主社會。如果說不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那也僅說明民主社會不是思想市場的充分條件，無法否定民主政治是思想市場的必要條件。

關鍵所在，無論該體制是否民主的。當今世界有着眾多的民主國家，不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與此同時，歷史上也有數個成為新思想大熔爐的非民主社會。自由思想市場的一大顯著優勢，在於它與多元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廣泛兼容性。思想市場在中國戰國時代一度非常繁榮，當時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學說相繼出現；唐朝時中國也有着繁榮的思想市場，當時的帝國首都長安吸引着來自亞洲多國的學者……思想市場未必是民主的同義詞。（頁259-60）

按常理，在說到當今民主國家不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後，還應該指出當今的非民主國家是否有真正的思想市場。不知是有意迴避還是疏忽，作者對此沒有交代卻突然轉到歷史中去了。問題是，歷史上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唐朝首都長安的文化交流等是否屬於真正的思想市場並沒有定論。退一步講，就算這些是思想市場，我們也無法簡單推出當今的思想市場可以在非民主社會出現這樣的結論。古代思想市場存在的條件是甚麼？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為甚麼這些所謂的「思想市場」僅曇花一現？古代的思想市場與現代的思想市場有無可比性？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討論。問題的要害更在於，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市場在當今只出現在民主社會，似乎沒有反例。如果說不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那也僅說明民主社會不是思想市場的充分條件而已，

而無法否定民主政治是思想市場的必要條件。

在論述民主制度下存在着多數人暴政危害思想市場等情況時，作者還引證了哈耶克關於民主的警告：「當前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必然導致自發的自由社會逐漸轉型為利益集團所控制的極權社會。」（頁259，註1）但哈耶克對民主的警告是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情況所發出的。1940年代，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出現了以民主手段實現並維持社會主義的思潮，哈耶克基於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認為這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獨裁和奴役之路<sup>⑨</sup>。但哈耶克並不認為民主不重要。相反，他認為「真正和本來含義」的民主是非常可貴，值得為它而戰。所謂「真正和本來含義」的民主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憲政制度的逐漸發展」<sup>⑩</sup>。這就是說，哈耶克對民主的警告是在肯定民主制度的前提下，為糾正人們對民主的錯誤認識和防止民主可能出現的負面作用而發出的。在哈耶克等思想家那裏，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民主，而在於要甚麼樣的民主。也正由於有了哈耶克等思想家的警告，人類對民主的認識才不斷深化，民主制度才得以不斷地完善。

今天，就像我們認識到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具有普世價值的經濟制度一樣，關於民主的普世價值也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共識。我們認識到，民主不是簡單等同古希臘城邦的多數人統治，也不是哈耶克所警告的「不受限制的

民主」。作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森 (Amartya Sen) 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說：「20世紀發生了許多著名事件。在政治思想領域發生的最重要的改變可能是承認民主是一種服務於任何國家——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無論是在亞洲還是非洲——的治理形式。」可見，根據森的觀點，民主是普適的。他還對民主作了兩點概括：第一，民主權利是發展的基本內容之一，其合理性不必通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間接貢獻來證明。沒有政治自由的公民——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被剝奪了基本自由和良好生活的基本內容；第二，民主不僅有利於經濟增長，還存在人類保障問題。民主對人類保障機制的貢獻力量遠遠超越了饑荒的預防 (森關於民主預防饑荒的觀點已廣為人知) ⑩。達爾 (Robert A. Dahl) 提出：我們應該相信民主比起任何非民主形式都好，理由是：民主能幫助我們避免獨裁者殘酷和邪惡的統治；民主能確保公民擁有一定數量的權利，而這是非民主體制不會也不可能做到的；民主政府比任何其他可行的政府形式更能確保公民擁有更廣泛的個人自由；民主還有助於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道德自主、人類發展，保護基本人權、政治平等，謀求和平以及繁榮等 ⑪。

如果我們同意以上關於民主的論述，就會認為沒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思想市場。因為有保障的公民自由是思想市場存在的前提。而當今世界，只有在民主政體下，公民的自由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

由於《變革中國》只是在中國的思想市場與民主政治的關係中提到及民主，而並沒有就民主政治的話題展開專門討論，因此我們無法僅憑這一點來了解作者的民主觀。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的科斯，他的思想與以上列舉的哈耶克、森和達爾等人的思想一樣，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偉大傳統都是一脈相承的。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成為貫穿《變革中國》全書的一條主線。正因為如此，《變革中國》關於民主政治與思想市場關係的論述確有點令人不解。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或可從下面的敘述中得到一些解釋。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祖師，科斯對制度多元化充滿殷切期待，尤其對市場經濟在「有別於西方」的中國取得成功殷切期待：

中國活力四射而又獨一無二的市場經濟，充分證明市場經濟可以在西方社會以外的地方扎根並繁榮發展。中式市場經濟的崛起為其他文化與歷史有別於西方社會的國家樹立了一個鮮明的榜樣。中國通過打破西方社會對市場經濟的壟斷，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全球化，並通過拓寬市場經濟的文化背景與多樣性，加強了全球市場秩序。如果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是僅僅局限於西方社會，而是在不同的文化與政治背景下繁榮發展，全球自由經濟秩序將會從此變得更加堅韌與可持續。(頁237)

由於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中國的市場經濟一定會保留中國特色，並會探索更多自己的

沒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思想市場。因為有保障的公民自由是思想市場存在的前提。而當今世界，只有在民主政體下，公民的自由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

《變革中國》對市場經濟「中式」或「中國特色」的肯定，不僅從文化傳統上拿不出確切的論據，在現實中也找不到正面的支撐；更與作者論證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基本邏輯有衝突。

特色。去掉了中國特色的中式市場經濟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們所不願意看到的。……如果我們能從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學到經驗的話，那就是應該鼓勵和頌揚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懷疑它。（頁262）

這裏所謂「中式」或「中國特色」，主要是指「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在文化傳統方面，凡談及「中國特色」，無論市場經濟或思想市場，《變革中國》無不從中國歷史上深挖根源：「中國對市場經濟並不陌生，並且從未缺少過商業和私人企業家。……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與當今中國市場經濟的復活有着直接明顯的聯繫」（頁235）；「思想市場的根似乎扎得比商品市場更深。……活躍的思想市場長久地貫穿於中國的歷史之中，產生了迷人的科技創新和我們現在仍在享受的輝煌燦爛的文化藝術」（頁258）。而關於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作者沒有具體描述，這應該是指有別於西方社會的制度，否則就無所謂「獨特」了。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的話，實際上應該是指非民主體制。因為中國不僅沒有民主政治的傳統，更主要的是現有的政治體制離民主政體還有距離。這就等於說，制度多元或多樣性是與非民主政治捆綁在一起的。那麼，書中多次提到的政治體制改革又該如何理解呢？難道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指向民主政治？

問題的要害在於，作為「中式市場經濟」文化傳統的支撐，比如中國是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是否存在過思想市場是個眾說紛紜、

爭論不休的話題，把這些遠未定論的話題作為立論的基礎不無問題；而把現存的政治體制作為「中國特色」的支撐問題就更大。前面已提及，今天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已經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而且在中國，民主是個好東西也已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共識。如此，把中國特色與非民主政體聯結起來就很難讓人接受。這一點暫且不論，要害的問題更在於，書中列舉出體現中國特色的諸多做法，比如國家以宏觀調控名義干預經濟，央企利用壟斷地位排拆私營企業等；另外，還有諸如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分割的土地制度等等，可以說，能夠被作者稱之為或算得上「中國特色」的，幾乎都屬於「建構論理性主義」的東西。如此，《變革中國》對市場經濟「中式」或「中國特色」的肯定，不僅從文化傳統上拿不出確切的論據，在現實中也找不到正面的支撐；更致命的是，與前面所論證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基本邏輯是衝突的。

所謂「我們時代偉大的故事」，說到底就是中國從共產主義天堂回到人間。這個「人間」主要不是傳統社會而是當下，這裏的關鍵是如何融入現代社會。不爭的事實是，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所謂「中國奇迹」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剛巧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快車。這樣說並不意味着我們不承認各民族和文化傳統間的差異和多樣性。哈耶克說過，「人類的獨特成就，即導致他的其他許多突出特徵的成就，就在

於他的差異和多樣性。」<sup>⑩</sup>多樣性與差異是「擴展秩序」的應有之義，也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但如果把整個人類視為一個種群，那麼不同文化傳統顯現出不同特色應該就是「個體差異」，各文化傳統的「差異」只能是體現而不是排斥人類這個種群的共性。這就是說，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應該是兼容的而不是抵觸的。甚麼叫「中國特色」以及如何保持中國特色值得深入思考和進一步研究。

科斯和王寧在書中也承認：「我們對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路的論斷並非對中國市場化轉型的最終評價。在這個非凡的故事裏，仍然有許多事實不為我們所知，需要繼續學習。」（頁263）何況「故事」所講的只是「中國市場經濟的開始」（頁264）。如哈耶克所言，「我們可以評價過去事件的意義。但當歷史正在進行時，它對我們來說就不是歷史。它帶領我們進入未知的境域，而我們又難能瞥見前途是甚麼樣子。」<sup>⑪</sup>確實，由於人的無知，一個具體的認識，就是像科斯這樣的大師的認識，也只是朝真理逼近而不可能達到真理。

從總體上說，《變革中國》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解讀不僅引人入勝，更發人深省。這確實是一部難得的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巨著。不幸的是，《變革中國》在中國面世不久，科斯便離開了人世，我們再也無法聆聽這位對中國充滿感情的大師進一步講述中國的故事了。但幸運的是，中國又開啟了新一輪的改革，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的故事將在深化改革中展現更加精彩、更加豐富的情節。

## 註釋

① 鄧小平：〈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1984年10月10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81。

② 「整體社會工程」又稱「烏托邦社會工程」，指任何一種理性行動必定具有特定目的。它有意識且一以貫之地追求其目的，並且根據其目的決定所採取的手段。參見波普爾(Karl R. Popper)著，陸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291。

③④⑩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馮克利、胡晉華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3；1、17；145。

⑤⑥⑭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王明毅等譯：《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50；54；31。

⑥ 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頁315。

⑦⑧ 波普爾(Karl R. Popper)著，舒煒光等譯：《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頁279；80。

⑩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民主向何處去？〉，載哈耶克著，馮克利譯：《哈耶克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369-70。

⑪ 森(Amartya Sen)、科利克斯伯格(Bernardo Kliksberg)著，馬春文等譯：《以人為本：全球化世界的發展倫理學》（長春：長春出版社，2012），頁25、29。

⑫ 達爾(Robert A. Dahl)著，李風華譯：《論民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41-50。

多樣性與差異是「擴展秩序」的應有之義，也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應該是兼容的而不是抵觸的。甚麼叫「中國特色」以及如何保持中國特色值得深入思考和進一步研究。